

河南省作协会员韩强毛

了不得

现在的新兵真是了不得,就说我们班里的李勤奋吧。

哪个新兵不注重给领导第一印象?新兵李勤奋却不以为然。在他分到班里的第二天,连队就进行新兵5公里越野选拔赛,取得前10名的新兵由连队组织经过3个月的强化训练后,代表连队参加团新兵5公里越野比赛。李勤奋排在连队28名新兵中的第17位,当然不在选拔之列。然而,当连长在军人大会上宣布10名人选名单后,李勤奋却“霍”地站起来大声说:“请求连长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也参加越野训练,3个月后,我保证以全连新兵第一的成绩参加团里的比赛!”顿时,新兵们“刷”地一下瞪大眼睛望着他。老兵们则嘴角一抽动,显得不屑一顾的样子。连我这个当班长的都觉得难为情死了,心里直对他说:李勤奋你真是了不得,竟敢在这么多人面前不知天高地厚地说大话。李勤奋倒像没事一样,说完便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连长却似乎很欣赏他,说:“有种!就算上你一个,到时只要你能进入前10名就让你参加。”我想连长也不一定喜欢这种说大话的兵,只不过不想挫伤他的积极性罢了。事后便有人戏称李勤奋是“了不得的李敢吹”。

按理说,话说出去了,就得用百倍的努力去实现誓言才是。可李勤奋给我的印象却不是这样。连队里规定,参加5公里越野强化训练的人员,在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的早上和星期二、星期四的傍晚必须按规定的內容训练,业余时间不作硬性规定,但提倡适量搞点训练。李勤奋在规定时间内练得还算卖力,但课余时间却没看见他怎么练习过。他要么在宿舍内外踱方步,要么到训练场边上津津有味地看人家训练。还有在上级预告抽查我们连队第二季度政

接母亲

把母亲接出来享几年清福,是埋在我心底已久的愿望。那年,我第一次探家,母亲才50出头,却苍老得像年过花甲的人,满头黑发似乎转瞬间变得灰白,原先干净利落的手脚,也变得迟钝了。望着母亲憔悴的面容,我心中一阵发酸。父亲早逝,母亲为把我们兄弟姊妹四人拉扯大,过分操劳才累成这个样子的呀!那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点名堂来,把母亲接出来享几年福!

斗转星移,我提了干,继而又具备了随军条件,便专程回家去接母亲。哪知母亲怎么也不愿离开家,住了一辈子了,我舍不得家,舍不得家里的地!”母亲不愿走,妻也因舍不得离开那美丽的小城,而终于未能成行。

这几年,妻常流露出要我转业的意思,我想也好,转业了,有了安定的家,把母亲接到城里也可了却我的心愿。不料虎年春节,我休假

治教育情况时,为了考个好成绩,大家都利用早晨、中午、晚上进行学习,有的甚至晚上熄了灯还到食堂学习。然而,李勤奋好像与此无关,课余时间从没见过他摸过书。晚上熄灯号一吹,上床比谁都准时。这样,他那懒的印象便爬进了我的脑海。对此,我先是在班务会上对他旁敲侧击,见他没反应,又找他谈心,大讲功到自然成、熟能生巧的道理,可他却说:“班长,我也在下苦功训练,只不过训练方法不同。该下的苦功我下了,该省力的我省了罢了。”对他这样的回答,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但对新兵又不能简单粗暴发脾气,只好继续引导说:“不管怎么说,课余时间人家都在训练场轰轰烈烈地练,你总得有所体现吧,你这么聪明的人应该知道新兵留给领导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吧。”你猜他怎么说:“这个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村那个退伍兵给我讲过好几回。但我却不这样看,我觉得新兵留给领导的印象固然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改变印象更重要。”这个兵嘴巴确实了不得,可惜就是行动不沾边。于是,我没好语气地说:“那就等成绩出来后再说吧。”

谈心过后,他仍和往常一样,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我便断定像这样的兵是出不了好成绩。但说来也怪,在连队进行的几次5公里越野小考中,他都小有长进,最好成绩能排到第8名。平时训练的其它基础科目成绩,他在连队也处于中上等水平,有时,我想他要是不那么懒,和大家一样在业余时间多练点,说不定还真是连队训练的一把好手。因而,尽管他的训练成绩还算不错,但我却从没表扬过他。

3个月一晃过去了,11名5公里越野的新兵最后一次排定名次。那天早上,我特意一边给他整理着装,一边对他说:“发挥你的最佳水

平,保持第8名我就心满意足了。”他却大大咧咧地说:“班长,你放心好了,说过要拿第一就拿第一!”我心想,这个兵到现在这个时候还嘴硬。然而,真正谁也没想到,比赛结果竟被李勤奋言中,他实实在在地排在了第一名。还没等我弄清事情原因,又一个关于他的好消息传来,团抽查我连政治教育考试分数下来了,又是李勤奋以99分的成绩名列全连队第一。喜得我们的连长和指导员一合计,当天晚上,连队宣布给李勤奋嘉奖,并让他当着大伙的面谈谈体会。

李勤奋却大喊一声“报告,等一会儿我就来。”说完,他蹭地一下蹿出了队列,弄得大家面面相觑。不一会儿,李勤奋拿了个东西进来,他站在队列前,两手把东西举得高高的说:“这两只沙袋每只一公斤,每次越野训练我都偷偷把它绑在小腿上,只是今天比赛时我没有用它。”接着,他放下沙袋,从兜里拿出个小东西,手一用力出现绿的亮光,又一用力出现了红的亮光。他继续说:“我有个习惯,喜欢在床上默背东西,所以每有该背诵的内容,我都是午休或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在脑子里过电影,记不住的我就借用这只袖珍电筒的灯光看书,然后再背。我觉得这样印象深,记得牢,这就是我的绝招。”大家都被李勤奋的讲话吸引住了,竟忘了鼓掌。我也在这时才领悟到他讲的“也在下苦功练,只是训练方法不同”的含义,这小子,还真了不得。

晚上点名后,我兴奋地在李勤奋的肩上拍了一下说:“走,散步去!”“班长,对我的印象变了吗?”李勤奋狡黠地说。你看,他就像猜透了我一样。这样的兵,了得不?

的小孩,挂念家里的鸡笼猪圈。她终于向我们提出要回老家去了。开始是几天说一次,后来竟发展到天天念叨,我们劝说不住她,母亲离不开农舍,只有那儿才是她生命的根。我想,她迫切地要到部队来,也许是一时的新鲜感所驱使吧。终于,母亲只在部队住了5个来月,便是归来了。

母亲回到家里,很快托人捎来了信:“娘让媳妇陪同去部队,是因为听说儿在争取早点转业。娘从儿这些年得来的立功喜报中觉得,部队需要你,你应该安心在军营。娘想,只有让媳妇和小孙子随军到部队,才能使儿安下心来干。所以娘就弄了这个计谋。本来,娘打算跟你们多住些日子再回来,但看到你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小俩口恩恩爱爱的,娘又想着你们的哥嫂家里还比较困难,娘现在的身板还硬朗,能帮他们一把。娘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女,希望儿子和媳妇能理解娘的心思。”看完母亲的信,我的眼睛湿润了,当儿子的竟未能理解自己的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母亲,一个在山沟沟里劳苦了大半辈子的母亲……母亲春天阳光般厚博的爱,我是无以报答的,只有一点请妈妈放心,儿子不会给您丢脸!

亲的心还细呀。儿子在家18年,要么我给他洗,要么他自己洗,还真没教过他洗脸呢。有这么细心的班长,儿子在这还有什么是放心不下的呢?行了,给儿子打个招呼就走。哎,还是不打招呼的好,要不,他的战友知道他妈想儿子想得专程到部队来,那还不笑话他啊!反正窗户里看到的这些足够了。

对,说回就回,不然儿子看到了,会分心的。

班长,哎哟,他这个班长可比我这个做母

差一点儿

得可以。我要调报社帮助工作的事,汪组长、宣传科长和师里政工领导都是知道的,但没有一个透露消息,我也就一直蒙在鼓里。直到4个月后的某一天,该报社的通报科长从兄弟单位采访路过我们部队,他当着我的面说起这事我才知道,我差点儿当了编辑的事。因当时选编辑有两个人选,本来确定了我,因我恋爱对象的事,才又易了人。我只有怨自己运气不好。

1983年12月底,我回赣中那座美丽的小城探亲。那时这座城市的地区报纸复刊不久,我家属厂里原在该报当编辑的一个同志,后来回去当了通报科长。由于搞新闻的缘故,我家属同我一起去见了那位科长。科长挺热情地说,报纸刚复刊,稿子缺得很,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利用假期给我们写点稿子,随便什么都行。

我家在农村,在与乡亲们接触中,发现这么一种现象,一向青昧农家肥种庄稼的家乡农民们,竟一窝蜂地迷信起化肥的作用来。主要是化肥种庄稼,庄稼长势好,成熟早,产量也高。但却忽视了成本高,地易结板,且种出的瓜不够甜,菜也没有

韩强毛

信阳市委常委会、信阳军分区政委,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他先后在《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报告文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香港大公报》、《前卫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200余篇,20多次获全国和省级文学作品奖。《情有多远》、《士兵命运交响曲》等作品集被解放军出版社、海潮出版社出版。

发生

发生在连队许许多多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是很有趣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忘得差不多了。而碎包子皮这件当时似乎不起眼的小事,却印象越来越深,总是忘不了。

在我們82无座力炮连,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任连长上任的当天晚餐,主食都是吃包子。赵连长上任的当天晚餐,炊事班蒸了五大蒸笼包子。蒸笼一抬进饭堂,很快被各班值日员把包子“抢购”一空,蒸笼里仅剩下几只面多馅少的厚皮包子和一些碎包子皮。

赵连长走进饭堂,一眼便看见躺在蒸笼里的那些厚皮包子和碎包子皮,便把炊事班长叫到身边,问蒸笼里的这些“残渣余孽”以往是怎么处理的。炊事班长如实回答:“都是拿去喂猪。”

赵连长听后显得有些激动,走到蒸笼边,对着只顾低头吃包子的战士们亮开嗓门说:“粮食来之不易和节约的重要性。同志们不懂,在这里我不多啰嗦。我只是告诉大家剩下的这些包子皮,明天早上和稀饭一起煮着吃!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凡是今后吃包子,小值日拿包子时,破了皮的要自觉拣进碗里,如仍是这样,做法不变!”赵连长说完,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拿着通信员给他拣的一碗薄皮包子大口吃了起来。

赵连长这番话,没产生什么效应。以后每次吃包子,蒸笼里的碎包子皮仍是那么多。但赵连长说话是算数的,每次吃过包子的第二天早上的稀饭里,准有包子皮。至于是否有人吃进肚里,他却没问过。只有收拾饭桶的同志清楚,桶底上沉积着的这些包子皮,扔进了猪槽。

在这年年底,赵连长调入机关当参谋,来了一位梁

现在往报社投稿真是容易极了。部队与报社都连着网,在键盘上用手指一敲,无论多少字,几秒钟就到了编辑手里。想想我们搞宣传的那段时光,为投稿的事可没少费劲。

我们那个部队驻在豫南的一个乡镇上。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前卫报》发到我们部队最快也得3天才能看到,我们投到报社的稿子,一般需要一个星期左右。要是直接往火车的邮件厢里送,可缩短2天至3天,有时赶得好,2天也可到编辑手中。这对于讲究时效的新闻报道来说,提前一天稿子到编辑手中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尽管部队离镇火车站有4公里,路也极不好走,但我们还是老爱往火车的邮件厢送稿件。

那时,在我们这个小站停车,通往济南方向去的火车每天仅有一趟,是武汉发往青岛的。到站的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多钟,停车3分钟。一天晚饭后,我同某团洪干事往火车的邮件厢上送稿。刚要出营区大门碰上了我们的宣传科长。当他得知我们去火车站送稿时说:“今天本科长高兴,评先进科师里刚刚通过。你们就骑我的自行车去吧,来去方便些。”我那时还不太会骑自行车,洪干事是福建泉州人,从小在家骑惯了的车。我听科长这么说,赶快说:“谢谢科长关心,谢谢科长关心。”顺手把自行车接了过来。这是一辆老牌永久载重自行车。其实是科里公用的。一般都是科长骑着,偶尔副科长也能骑骑,有时情况紧急,老干事们请示科长也能急用一下。我那时是科里最新的干事,从没想过要骑自行车的事。往火车上送稿,都是步行,那时我们年轻,

农家肥种出的味道好。与此同时,我了解到我们大队有一农户坚持用农家肥种庄稼,不仅成本低,质地结构好,而且种出的瓜菜销路好,是我们大队屈指可数的富裕户。我便写了篇《农家肥使他致富》的新闻稿,地区报刊用时还配了题目叫《不要冷落农家肥》的短评,接着,省级报纸也转载了。该报社的通报科科长便对我感兴趣,说我们报社正缺编辑记者,你要是愿意,可以立即转业到这里干,你既可以继续发挥特长,还可以照顾到家庭。说得我动心了,他又同我去见了报社社长,社长也承诺,只要转业,到我这里干没问题。这样我假期没休完,就跑回部队要求转业。

宣传科长一听我要求转业,不问青红皂白便劈头盖脸地把我训了一顿,但经不起我再三解释和软缠硬磨,他也认为机会难得,才动了惻隐之心。说我这里好说,主任那里怎么办,你这样如实讲是肯定行不通的,得要充分的理由知道吗?他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又说,比如说,你家在农村,爱人的父母虽在城里,但各自都有工作,你爱人一人既要照顾孩子,又要上班,困难肯定很多。接着



作者韩强毛(右一)欢送新兵入伍。

碎包子皮的故事

连长。梁连长上任的那天晚餐照例是吃包子。他一进饭堂也一眼看见蒸笼里的碎包子皮,就从桌上拿着自己的盘子和筷子把那些碎包子皮夹进盘子吃了起来。

通信员见此情景,快步走到梁连长身边低声说:“连长,您的包子装在碗里了。”

梁连长说:“那这些不要了?倒掉岂不太可惜。”尽管他声音不大,但食堂里此时格外地静,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不知是梁连长话的作用,还是行动的力量,第二次吃包子时,蒸笼里的碎包子皮明显减少了。仅剩下碗把包子皮和一只厚皮包子。梁连长照例拿筷子去夹,结果被一位老班长抢在了前面,接着又有两名战士抢在了他前面,很快把蒸笼里的碎包子皮“打扫”得干干净净。以后每次吃包子,蒸笼里就再也见不到碎包子皮了。

两位连长处理包子皮的这件小事,似乎当时印象并不深刻,但事隔一年,我提为干部后,第一次向部属安排工作时,两位连长在蒸笼旁各自对碎包子皮的“表演”,却倏然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逼我两者必择其一。于是,我笔记本的扉页上就有了这么两句话:“不说吃而不吃碎包子皮的干部,要做能会说吃碎包子皮的干部。”以此来对照检查自己的行动。

光阴荏苒,转离开连队已30年了,我也由战士、文书、司务长,一步步走上了副师职领导岗位,但碎包子皮的事,在我笔记本扉页上的那两句话却铭刻在心,它一直监视着我的行动,使我无论带部属干什么都身体力行。为此,我负责的工作都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多项工作还争得了先进,个人也获得了相应的荣誉,先后8次荣立三等功,20多次受到上级通报表彰和嘉奖。

投 稿

4公里路程紧赶小跑半个小时也就到了。那晚火车正点,送稿挺顺。一出火车站,洪干事催我上车。我总感到坐上没把握,心老悬着,便说:“天黑,我们还是走走吧。”他似乎猜出我的心思,说:“上来吧,我骑慢点就是了,保证没事的。”我一坐上,他的脚便不由地用力猛蹬了起来,骑着骑着,便听见“咚”的一声,自己没弄清咋回事,便摔了个仰八叉。“完了完了,我的脸烂了,门牙也断了。”原来,我们的自行车碰上了一辆停在路中间的吉普车的屁股上。从镇到部队有好长一段路没路灯,赶上没月亮的夜晚是漆黑一片。我赶忙将洪干事送到师医院,还好脸上划的四五个口子都只有米粒大小,门牙碰掉了一颗,没大的破相。自行车可就惨了,前轮碰变了形,车把碰拐了弯。

三九严寒的一个晚上,我和报道组两位报道员一同去火车站送稿,结果碰上火车晚点。冷北风刮得呼呼响,走路时不仅不觉得冷还出了些汗,但一停下来里面湿衣粘背真觉得透心凉。还好车站值班的同志是个熟人,他让我们放心地走,他负责把稿子送上车。但我们总感到还是亲自送上火车心里踏实些,他便让我们到值班室等,值班室有车,这才缓过劲来。开始说晚两个小时,结果两个小时后又说再晚一小时,就这样等着等着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钟,车才到站。

说来也怪,我们通过火车投过去的稿子大多数被采用,而通过邮局寄去的稿子的命中率就低得多。现在想想也不奇怪。一般是自己感觉较好,时效性较强的才往火车上送,感觉一般、时效性不强的稿件才邮寄。

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这虽是理由,但还不是很充分,这样的困难只要是军人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你们那里不是革命老区吗?老区人才缺乏,要是你家乡报社的那个科长能以报社的名义写封信给主任,就说办报缺乏编辑人才,让部队从支援老区的角度考虑,让你转业。主任是个老“马列”,说不定这样能认可。我当时非常佩服宣传科长的水平,觉得他考虑问题很周全,遇事很有办法。我立即给家乡报社的那位科长写信。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电话等联络工具,几分钟就能把事情说的明明白白。那时联络主要是写信或拍电报。像这样的事情,拍电报很难说清,只有写信。这位报社科长也确实想促成这件事,接信后就按要求以报社的名义给我部队的宣传科长和政治部主任写了信。在宣传科长的斡旋下,主任真的同意了。并将我的转业名单报到师里。由于成为转业对象,我理所当然地请继续休假,回到老家便主动到报社的通报科帮忙。

满以为当编辑是不成问题的了,谁知,没过几天,部队便拍来电报,让我接电速归。回到师里才知道,我们的汪组长调军里任新闻干事去了。于是我便成了师报道组长的合适人选,师里领导也是这样认为,又不让我转业,而让我担任师的报道组长,军令如山,我只有服从。

从这以后,随着军龄的增长,年龄的增加,岗位的转换,职务的晋升,我才渐渐地放弃了当编辑的念头。